

# 身体与符号\*

张 兵

**摘要：**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试图以其“操演”理论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理论中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超越西方的文化、哲学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关键词：**身体，符号，能动性问题

## Bodies and Signs

Zhang Bing

**Abstract:** By virt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body” has been becoming a key term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s exploration of the notion of a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Conversely, “sign” has become the basic element of cultural analysis for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ody. However, body is invested with a prominent image while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西哲学比较中的身体维度研究”（项目编号：13YJC720045），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性别操演’的‘身体’动因问题”（项目号编号：13SZYB19），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原罪的颠覆：身体美学的理论重构及其意义研究”（项目号：2013Jk0027）的阶段性成果。

simultaneously forming the problem of *hiddenness*, which can be stated as “the problem of agency”. Butler has developed a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to face the issues of discourse determinism, but she eventually falls into the conflict with the notion of flesh, which oversteps her constructed body premise. We are, therefore, compelled to rethink the flesh body in a new context, and even to explore the problem beyond the frame of Western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Key words:** bodies, signs, the problem of agency.

如果“转向”是基于过往运动历程的反动环节，则“身体转向”“符号学转向”这些表述的流行不仅显示了“身体”与“符号”在当前理论运动中对哲学中央舞台的渴望，而且暗示了其声名鹊起的原因，即对自身被压制的隐秘历史的重述及重新肯定。在自我认定的努力中，“身体”与“符号”共同营造了当代哲学的某种氛围，并且在摆脱心理/身体、所指/能指的二元结构中相交织。然而，在身体与符号的汇流乃至重合之中，身体固有的疑难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这一新的形态中包含符号的“失败”，这一“失败”在肯定与否定意义上都与能动性有关，但能动性的内在要求又指向了符号化身体的反面，构成了身体运动的又一个反向环节。

—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不是通过身体而是通过“祛身体”（decorporealize）来实现的，在笛卡尔对“我思”的执着中，“我有一个身体”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事实被搪塞过去。<sup>①</sup>“身体”是不在场的，对于身体

---

<sup>①</sup> “对身体的遗忘”浇铸了笛卡尔影响深远的二元结构丰碑，这一“密码”在胡塞尔自谓“20世纪的笛卡尔主义”中仍一脉相随，思维的“纯粹性”首先意味着纯粹于身体性（Leiblichkeit），对自我身份的肯定与对身体的剥离在同一行程。更大的问题在于，对身体的贬损不仅仅是在具有深度的高水平认知层面上，在不纯粹的感知层面上也有一个“忘身”的自然行为。我们暂且借用胡塞尔“原意识”（Urbewußtsein）和“后反思”（Reflexion）一组概念，尝试分析布伦塔诺曾列举的一个与“内感知”——有时也被胡塞尔称作“原意识”——相矛盾的例子：当我想观察在我胸腔中熊熊燃烧的怒火时，那怒火必定已经冷却了。抛开胡塞尔及其他现象学家关于“后反思”定义的复杂争论，这里，在反思中，“怒火”已经失去了其强烈情绪的身体性特征，变成了意识的纯粹内容；在原意识中，在我不可遏止的暴怒中，虽然有剧烈的身体动作，我却意识不到我在发怒，怒火在我的注意力之外。这后一种情况通常被看作笛卡尔式二元结构的一个效应，但在 Drew Leder 看来，身体在身体活动中这种自然的“非对象化”恰恰“在鼓励和支持笛卡尔二元主义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具体论述可参见 Drew Leder, *The Absent Bo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社会学的倡导者特纳来说，将“不在场”（absent）看作对身体的“忽视”“湮没”或许更恰当些，“因为社会学理论中的身体实有一段私下的、隐秘的历史而非全无历史”。<sup>①</sup> 特纳的“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body，其《身体与社会》一书于1984年首次出版）常被看作身体诸问题的涌现节点，“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人文社科领域关于身体的著作有一个大爆发”<sup>②</sup>，此爆发不仅指著作的数量，也包括讨论的领域，即身体不再局限于生物学之内，而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社会文化议题。

事实上，当代的身体研究之为人所瞩目应追溯到福柯，用特纳本人的话说，《身体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米歇尔·福柯哲学的一个运用”<sup>③</sup>。的确，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该书于1975年首次出版）——这本福柯称之为“我的第一部著作”的开篇，描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身体施予惩罚的场面：

人们把挽马用的绳索系在犯人身，再给马套上挽绳，把马分别安排在四肢的方向。……4匹马分别由4名刑吏牵引着，向4个方向拖拽四肢。一刻钟后，又重新开始拖拽。最后，经过几次尝试，不得不对马拉的方向做些改变……接连试了两三次后，刽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铁钳的刽子手各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匕首，不是去切断大腿关节，而是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身体。4匹马一用劲，拖断了两条大腿，即先拖走了右腿，后拖走了左腿。然后对手臂、肩膀等如法炮制。刽子手切肉时几乎别到骨头。马先拖断右臂，然后拖断左臂。<sup>④</sup>

这是福柯以谱系学方法从“羊皮纸文稿”中发掘出的历史事件。该引文不厌其烦地、细致地描绘了身体受刑的残酷场面，这种表达法与权力的控制意图和震慑效果相一致，而福柯丝毫不顾虑读者心中可能感到的种种不适，将达米安（Damien）受刑的场面完整地摘录了下来。而这具象的身体，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身体，固然令人难忘，却绝不是福柯研究的主体，也不是特纳将其“身体现象学”归功于福柯启示的原因。不过，在这

①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2<sup>nd</sup> edn. London: Sage, 2004, p. 63.

② Mary Evans and Carolyn H. Williams, eds., *Gender: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4.

③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2<sup>nd</sup> edn. London: Sage, 2004, p. 63.

④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4~5页。

个血腥的场景中也包含着福柯所要分析的内容：权力对人（身体）的作用。对达米安的惩罚是传统权力运作的典型方式，与现代的权力运作技术已大相径庭。现代权力运作的方式是温和的、道德的、科学的，而不是野蛮的。仍以惩罚来看，“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接触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身体的痛苦不是惩罚的目的，“人的身体只是一个工具或媒介”，从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上看，“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sup>①</sup>相应地，施罚者也不再是刽子手所代表的权力核心人物（比如君主），而是由看守、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教育学家等组成，甚至还包括受罚者本人。因此，与传统政治权力的纯粹压制、强迫功能不同，现代权力的运作虽仍有控制性的一面，但其控制性恰恰要依赖于生产性——将权力的意图内化到其作用对象的灵魂之中使之成为权力的积极实践者。

在福柯所描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转换格局中，身体的形象也有一个相应的变化。身体不再是一个生物学的物理事实，有其自然的、固定的物质形态，而是一个总是由权力覆盖、赋予（invest）其意义的被驯化的温顺的身体。从这个方面来说，身体不仅仅是医学探究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经验对象，“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sup>②</sup>，权力的运作给身体打上标记，使身体呈现为“政治的身体”<sup>③</sup>。由此，身体不是一个孤立、僵化、自然的存在，而是被权力、社会、文化不断塑造、建构的结果。从其现成性上看，被建构的身体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为一种回溯性的研究提供了依据：身体以其被建构、以其所镌刻的社会密码而成为社会研究的棱镜，通过对“政治身体”的微观分析，可以探察其中所蕴含的权力运作“秘密”，将其解码并使之呈现出来。这可以看作“另类”的社会学研究，福柯自谓之“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这一研究方式构成了当代“通过身体思考”（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的重要维度。

因此，也可以如特纳所说，“身体社会学”源自福柯的发明。自福柯开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11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30页。考虑到福柯“政治”与“权力”相应的广义性，即政治无处不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政治身体”也可以称为“社会身体”。此外，福柯所强调的“灵魂是肉体的监狱”（第32页），表明了现代权力对人的管控是不可见的、深入灵魂的，故可把灵魂“视之为与某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相关的存在”（第31页），它不断在身体的周围、表面和内部产生出来，从而使身体成为一个文化的存在而非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因此“政治身体”亦可被称为“文化身体”。

始，单谈论一个固定的、自然的身体已经不太可能，身体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身体。以此之故，身体也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身体就是一个“文一本”（cultural text），可以由文化在其身上书写。“身体是铭刻（inscribe）事件于其上的平面”，事件之迁流构成了历史，则“历史就是生成变化的具体的身体”。历史总是将其生成变化的谱系附着在身体上，则谱系学的方法，“作为谱系来源之分析，也就处在身体与历史的联结（articulation）之中。它的任务就是展露一个被历史标上印记的身体，展露一个历史对身体破坏的过程”。<sup>①</sup> 这一分析和研究，将不再是一个“‘观念史’，其中只根据身体被感知以及被给予意义和价值的方式来思考身体，而是一个‘身体史’，其中根据身体被赋予的最具实质性的和至关重要的东西的方式来思考身体”<sup>②</sup>。

福柯的“身体”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身体，一个文化铭刻的身体，“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去理解身体是如何通过象征、符号、意指活动及话语实践来建构的”<sup>③</sup>。对于福柯来说，“身体”及其晚期着重分析的“性”都是话语（discourse）实践的产物，权力的运作就是话语生产，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则福柯的社会建构论也可谓是“话语建构论”。此处的“话语”，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或源于符号学，则“身体”概念的社会化，或许离不开符号的意指功能。

## 二

通常，索绪尔被看作现代符号学/语言学的开创者，他通过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异质的言语活动，而是其赖以存在的作为一个共时性结构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符号系统的组织单元，“符号”的基本结构可表达为“所指/能指”，由于单个符号从属于整个符号系统，故符号的意义是从其与其他符号要素的区别中获得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结构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源于符号系统内部要素的“分节”（articulation）思想，对于强调符号的本源性地位有重要意义，即语言符号不再是传统表现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 83.

<sup>②</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52.

<sup>③</sup> Lisa Blackman,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8, p. 22.

论意义上的思想传递媒介，而是思想所从出、所可能之地基。海伦·凯勒的故事仍然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下面是海伦的老师沙莉文小姐记述的海伦的“水之悟”：

今天早上，梳洗时她（海伦）想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知道一件东西的名称时，她就会指着它并轻拍我的手。当时我拼了“w-a-t-e-r”，并没有想太多。直到早饭后我才意识到，借助这个新词，我可以成功地解决海伦混淆“杯子”“牛奶”这两个名词的困境。那时我们出去走到了水井房，我让海伦拿着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而我来压水。当凉凉的水喷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掌中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冲击到她手上的感觉联系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她看起来吃了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一道生气开始出现在她的脸上，她连着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跌坐在地上问地面的名称，接着把手指向了水泵和水房棚，突然她又转过身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一词。……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处于高度兴奋中，学习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以至于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她的词汇量增加了三十个新词。<sup>①</sup>

这段文字亦曾被宣称“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卡西尔引用过，用来说明“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sup>②</sup>这一原理。卡西尔的“原理”也许是对的，但海伦此处的“突破”还不是用来支撑这一原理的。海伦借“水之悟”所达到的由“指号”（信号）到“符号”的跃迁，不是因为她明晓了符号的普遍性，而在于她理解了符号所具有的意义之真正含义，正是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赋予了符号意义，那“凉凉的水所提供的刺激”与那个已经强化过的拼写“w-a-t-e-r”为这一差异提供了生动的注解，借助这一差异，那个混沌、黑暗的世界才以明晰的面貌向海伦呈现出来。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最后，海伦才能领悟到“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称”<sup>③</sup>的含义，否则，符号只是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批判，只是凭空增加了存在事物的数量，增加了点数的困难程度而已。

<sup>①</sup> Helen Keller, *The Story of My Life: With Her Letters and a Supplementary Account of Her Education*. 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 2009, p. 408-409.

<sup>②</sup>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48页。

<sup>③</sup> Helen Keller, *The Story of My Life: With Her Letters and a Supplementary Account of Her Education*. 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 2009, p. 408.

如卡西尔所说，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sup>①</sup>。符号所意指的概念并不是事物本身，“是词语的世界创造出了事物的世界——事物起初是混杂在将要生成的此时此地的总体中——词语赋予它们的本质以具体的存在”<sup>②</sup>，上帝创世可以看作符号意义创造的隐喻，是语言符号使世界成为人们生活的世界与可被我们理解认识的世界，进一步而言，乃至人这一主体（subject）也是符号的创造物，用拉康式的表述来说就是，“人”是能指的效果，“人的本质变成由语言的结构显示其中的效果所编织的，其中他成了语言结构的素材”<sup>③</sup>。如果说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符号还存在一个深度结构和表层现象的区分，拉康则完全颠覆了这一区分<sup>④</sup>，强调语言符号的创造性、建构性特征，不仅是人在说话，同时也是话在说人，人其实是“话语”的效果物。

借助符号学，拉康极大地改变了精神分析的气质，把弗洛伊德的生理主义发展为语言文化分析。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拉康理论极具哲学革命意义的内涵是对笛卡尔“我思”这一统一性主体的攻击，即作为主体的“我”是语言形构的效果。形构的关键源自一种“身体形态学”的展示，因此，作为功能的自我身份的建构也是身体的话语符号的建构，“身体”是符号意指功能的话语实践的效果。拉康对身体形态学的阐述有赖于其对弗洛伊德“身体自我”的镜像式说明，他将弗洛伊德的经由体验（例如痛苦）而知的身體分析为在语言中被意指的身体。在自我的形成上，弗洛伊德谈道：“自我首先是一个身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6页。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6, p. 229.

③ 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6, p. 578.

④ 以符号的基本结构为例，索绪尔将其表述为 $\frac{\text{signified}}{\text{signifier}}$ ，在拉康看来，如果两者以一种上项和下项平行结合而成的整体出现的话，这个算式就是一个谜一样的神秘符号，于是拉康将其改写成 $\frac{S}{s}$ ，并将其视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础算式。接拉康的解释，这个算式可读作如下：“能指在所指之上，‘之上’相当于分开这两个平面的横杠（bar）。”（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p. 415.）这个读法在两个方面与索绪尔截然不同：（1）能指以大写的S表示并被置于横杠之上，表明能指的优先性而非所指的优先性；（2）能指与所指中间的横杠不再表示二者的结合，而是意义对能指的抑制，能指总是抵达不了所指，只能靠引向另一个能指才能成立，因此，所指只是能指在能指链中不断滑动所产生的效果，即所指是语言符号的运动效果，是话语的产物。

体的自我；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实体，而且它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投射。”<sup>①</sup>在镜像形态学上，拉康同意这一观点，即自我是受身体在镜中形象的激发形成的，“这一点教导我们不要把自我看作居于感知—知觉体系的中心，也不看作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而成的”<sup>②</sup>，而是受惠于误认的功能。拉康用 *homelette*<sup>③</sup> 一词指称六个月之前的婴儿，此时的“小人”是一个没有自我观念、未分化的存在，相应的，其身体的自我觉知是混沌的、杂乱的、碎片化的，借助于他偶然在镜子里瞥见的自我身体的形象 (*imago of one's own body*)，这个“小人”获得了对其身体统一性的把握，并在这种身体轮廓的统一性中获得了自我的确定性身份。相对于其实际的身体能力，这一完整的身体形象是超越其身体发展实际水平的，因而是早熟的，也是外在的，把镜中之像当作自我，其实是把“他人”误认为自我。这一误认亦发生在随后更具普遍性的以语言符号为镜的主体的确立中（想象域的故事情节可以看作符号域剧情的形象展示），借助符号之镜，想象域的“自我” (*ego*) 在符号域中注册为“主体” (*subject*)，相应的，在拉康所谓的符号域 (*symbolic order*) 中，可以说，身体是被话语建构的。

没有预先给定的身体，身体是符号建构的结果，前话语的身体也是不存在的。虽然晚期拉康谈到真实域的身体 (*body as real*)，但这并不构成对其符号建构的身体的挑战，“身体是真实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前符号 (*pre-symbolic*) 的，而是由于它不能依赖于能指得到理解”<sup>④</sup>；同样，由内在感觉所确证的身体观也与拉康的符号建构论截然相反，如其所说，“他者的享

① 弗洛伊德：《自我与自我》，杨韶刚译，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弗洛伊德在该书的英文版（1927）中给出了一个脚注：“意即，自我基本上是从身体的感觉中派生的，主要是从身体表面产生的那些感觉获得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是身体表面的一种心理投射，另外，如上所见，它代表心理结构的外观 (*superficies*)。”巴特勒对此有一个评论，“尽管弗洛伊德在此试图解释自我的形成，并宣称自我源自被投射的身体表层，但他无意中建立了将身体切分 (*articulation*) 为形态的前提”，并将这一线索与拉康镜像阶段“重写形态学 (*morphological*) 的想象”联系起来。（参见：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97, 41.）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6, p. 80.

③ 这是拉康所造的合成词，由 *homme* (人) 和 *omelette* 叠加而成，后者有“小”和“蛋”两义，故其既可指六个月大的“小人”——婴儿，也指“蛋形人”。该词借用了柏拉图《会饮》中阿里斯托芬所讲的神话中圆球人的形象，此“蛋形人”指尚无自我身份意识（例如没有性别身份意识）、尚未分化（分裂）的存在。

④ Sean Homer, *Jacques Lac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21.

乐——为身体象征的他者——绝不是爱的记号”<sup>①</sup>，即，身体不是体验的、活生生的身体。

对于福柯来说，身体是被权力话语铭刻的，对于拉康来说，身体是被能指符号写就的。尽管表述上有着细微的差别，一个可谓社会建构论，一个可谓符号建构论，但二者在外在建构性方面是相通的，其中，身体因符号的意指而关涉于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而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

### 三

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方式，身体建构论一度为当代女性主义的“翻身运动”诉求所看重，由此，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批评也体现了一个从生理的身体到话语的身体的位移。话语建构的身体观为女性摆脱“生理即命运”的生理本质主义枷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也成为后女性主义性别政治斗争策略的前提。从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彻底摆脱两性之间的生理逻辑需要采取符号建构论的立场，即，甚至传统中有关两性生理身体的刻画也只是话语的建构，“本质的生理性别，真实的或固定不变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些概念本身也是作为策略的某一部分而被建构的”<sup>②</sup>，用福柯的话来分析，这些策略都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它服务于男性。相应的，出于某种策略考虑，后女性主义采取了建构论的立场，并把它推到极致，其中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sup>③</sup> 可谓其典型。

在巴特勒看来，身体是被建构的这一立场，其确立无疑与福柯有关。身体是一个话语和权力体制铭写自身于其上的场所，社会的变迁、权力的运作、文化的流行总是会在身体的表面上留下痕迹，如此，身体的表面就是一个写满了符号的文本，记载了社会、权力、文化运作的轨迹。这些轨迹就是身体

①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p. 39.

②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80.

③ “操演”的原文为 performativity，有人将其译为“表演”（将其与剧院的 performance 相联系）或“施为”“述行”（这种译法考虑到该词的 performative 这一语言学渊源以及巴氏对奥斯汀“以言行事”理论的借重），本文采用《性别麻烦》一书中译者宋素凤的译法，原因在于，巴氏本人已澄清用 performativity 一词首先在于将其与 performance 区别开来；其次，该语虽有奥斯汀的语用学线索，但还包含福柯、拉康、德里达等的话语思想，已经成为巴氏本人的概念，似不应专属奥氏；此外，中文“操演”一词既可表达建构的外在管控性，又含有个体的强迫重复乃至生产的积极性，可承载 performativity 的丰富含义。

的“身世”，如巴特勒所引福柯《谱系学》中的文字，“身体是铭刻事件于其上的平面”，相应地，谱系学的任务就是“展露整个被历史标记的身体”，借助于身体这一具体事物的微观分析就构成了社会文化分析。“在许多文本中，福柯明确质疑存在一个物质性的身体，这一身体断然有别于在专门的社会领域内建构身体的那些观念的和文化的意涵”<sup>①</sup>，比如在《性史》中，福柯明确宣称不存在一个先于律法的“身体”，也不存在一个与权力关系绝缘的“性”，但福柯有关铭刻的身体的分析模式，却潜在地包含着一个可以推论出的矛盾，即“权力必定要外在于身体本身”，“福柯描绘这一建构机制——身体经由文化建构形成——的努力，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事实上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其建构的身体，一个其建构中不变的身体，以及，事实上代表了一个对于文化本身给予抵制的动态位置”<sup>②</sup>。从字面意思上看，“铭刻”即书写于其上，在书写之前应有一个承载体、一个空白的场所，类似于洛克的白板（tabula rasa）——一个便于刻写的空白平面，则“铭刻于身体之上”是否预设了一个等待被书写的身体，一个尚无任何意义、等待文化形式赋义的材质？如果把建构理解成福柯所说的铭刻，则此处理应存在一个先于铭刻的身体，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稳定的存在物成为建构的地基，成为接受诸建构的受体。

再回想一下我们文章开头所援引的福柯关于惩罚场景的生动描述。传统的“体罚”是将酷刑加诸身体，近代以来的惩罚则转变为将体面的、温和的、道德的管控技术加诸身体，同理，后者仍需要一个痛苦或意义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身体被理解为一个工具或媒介”<sup>③</sup>，福柯仍然会陷入“生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二分的僵局之中。对于巴特勒来说，身体的物质现实性总是早已在一个社会情境中被定位并被规定的，以性别身份为例，并没有一个不被性别化了的身体，即，没有一个前话语的、作为一个自然事实的先定的身体，由此，巴特勒区分了表演（performance）与操演（performativity）。以表演来说，在一个异性扮装舞会上，人们清楚地明白一个人所扮演的性别（gender）角色与他本人真实的生理性别（sex）并不相匹配，人们知道在他（她）的如此妆容、如此举止之后有另一个行为主体，舞台情景支持了这一区

① Judith Butler, “Foucault and the Paradox of Bodily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9, 86 (11): 603.

② Judith Butler, “Foucault and the Paradox of Bodily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9, 89 (11): 602.

③ Judith Butler, Foucault and the Paradox of Bodily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9, 89 (11): 60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11页。

分意识；但如果是公交车上一个坐在我们座位旁边的易装癖者，则很难被视作为表演，他的如此妆容往往构成了对我们严重的挑战。<sup>①</sup> 因为生活中我们是从他们的体容、体貌、体态读出他们的性别身份的，这些诸行为、品性本身就是主体，主体是由这些属性构成的而非先在的，也不是支配这些行为的意志体，如其所引用的尼采的话，“在所作所为、施行、生成的背后并没有‘存在者’；‘行为者’仅仅是附加到行为之上的一个虚构——行为就是一切”<sup>②</sup>。故对于操演来说，并没有那样一个生理的身体，并没有那样一个行为主体，主体（包括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机构、话语和实践的效果而非原因，身体亦如是。借助一种彻底的话语建构论，巴特勒可以对异性恋的男权统治霸权展开攻击。异性恋身份只是话语建构的诸形态之一，此外还有跨性别主义者、变性性欲者，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话语建构为我们展现了多种可能，女性可以有一个更广阔、自由的表现空间。

排除了福柯在身体问题上可能的形而上学残留，我们看到，巴特勒又将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即摒弃了作为行动者的身体和作为选择筹划的主体，性别操演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又如何可能？既然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我们又如何选择建构的方向和样式？这个问题对关注“自我呵护”的晚期福柯同样有效。在福柯那里，身体是被动的，被动承受权力运作的烙印；它是灵魂围剿的目标，灵魂以其无上智慧把身体作为碑石刻写自己的丰功伟绩，身体在文化的覆盖中沉默失声。因此，虽然“身体”因福柯而声名鹊起，但在福柯的建构论中却是一个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福柯的微观分析只是一种呈现，一个沿着谱系的回溯，无法为自我的未来提供有益的线索。如克莱茵评论的，“我从后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读到的身体没有呼吸，不会欢笑，也没有心跳”<sup>③</sup>，身体只是话语的效果物，我们很难指望通过身体影响或者回击那作为规训权力的话语。

这个“能动性”（problem of agency）<sup>④</sup> 与作为另一种决定论的话语

① James Loxley, *Performativ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42.

②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33.

③ Jane Pilcher, Imelda Whelehan, *50 Key Concepts in Gender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8.

④ “能动性”的英文词为 agency，有时它也被译为“代理”，此处所讨论的问题也与这个方面的含义有关。在话语建构论者看来，没有一个先在的、统一的、实体的主体，主体也是被建构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主体观，此处的主体只是一个空洞的主体，如拉康所引用的诗词，“我们内中空洞/我们塞得满满/彼此靠在一起/头盔里填的全是稻草。噢！”（参见：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p. 234.）我们只是空心人、稻草人，只是一个转换词（shifter），主体这个词只是一个代理，没有自主权，其被动性就构成了个体自主选择的难题。

建构论有关，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将社会建构的身体视作对于自然主义的身体的替代方案，这一趋向只是从一种形式的决定论——本质主义，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话语或社会决定论”<sup>①</sup>，如此，后者只是前者更复杂的形式而已。话语建构论的这一两难典型地体现在拉康作为女性主义者“不可思议的盟友”（strange bedfellows）这一角色中；当代女性主义者借用了许多拉康的思想，但在根本性上又将拉康定位为男性中心论者、菲勒斯中心主义者，因其理论仍使女性陷入男性话语体系的决定，符号建构论变成了先验建构论。

能动性这个概念主要关涉的是个体抵抗、协商或者拒绝规训权力起作用的能力，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能动性是其性别政治的核心问题。福柯的话语谱系可以揭示女性在权力运作中的不利地位，但女性主义更关心的是如何改变话语实践中已建构的女性形象，那么，能动性在女性主义这里又可表述为：如果性别是经由建构变成的而不是一个先天如此的存在状态，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变成？更进一步，对于巴特勒的“操演”理论来说，操演所具有的自由存在来自话语的重新意指（re-signification），那么改变已有话语的意涵的动力何在？简言之，“能动性被重新表述为意指和重新意指如何运作的问题”<sup>②</sup>。

#### 四

一种对“操演”错误理解的观点是，“操演是个人意志运用语言的有效表达”<sup>③</sup>，例如，性别身份的获得，就像某人早晨醒来，打开摆满各种样式、各种花色服装的衣橱——隐喻各种性别身份的集合（由话语建构的诸效果物的陈列室），随当天的心情与愿望选择其心仪的一种“穿上”或“脱下”。将与这种流行性见解相关联的“能动性悖谬”向前推进一步，则其理论前提为：“（a）只有诉诸一个前话语的“我”，能动性才得以建立，即使那个“我”存在于一个诸话语的交集中；（b）被话语建构就是被话语决定，此决定排除了能动性的可能性。”<sup>④</sup> 在巴特勒看来，回答能动性的问题，不必回归一个先于意指过程存在的“我”，因为那个“我”是建构的结果而非原因。与清晨的妆

<sup>①</sup> Lisa Blackman,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8, p. 28.

<sup>②</sup>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84.

<sup>③</sup>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39.

<sup>④</sup>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82.

扮相比，操演否定了那样一个类似表演结构中服饰之下的自主身体的担当者，“表演预置了一个前存在的主体，而操演则对这一主体观提出质疑”<sup>①</sup>，甚至，操演所关涉的政治伦理道德诉求首要在于对此主体观的破除，“服务于某种形式的权力的统一主体观必须遭到质疑并得到消解，因其意指某种类型的男权主义，这一主义抹杀了性别差异并确立了对生活领域的统治权”<sup>②</sup>。

不存在一个自我决定、自我选择、自我谋划主体，与这种主体能动性相应的具有强烈情感与坚强意志的物质性的身体也被抹除了。“能动性”在主体性上的悖谬在于，主体只是一个代理（agency），其形成依赖于我们永远无从选择的话语，同时，这些话语也产生并供养我们的能动性（agency）。坚持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则不能从身体方面而应当从符号角度去寻找话语建构论中的能动性。从其最初意义上，社会建构论的建构即是一种能动性的表现，这一建构作为符号之建构是符号之能动性的表现，其根源，在索绪尔那里是使个体言语活动成为可能的作为深层结构的整个符号差异系统，在拉康那里是作为大他者的无意识的话语，具体言之是能指在能指链上的回溯性意指。总之，把建构中的能动性归结为符号，在于符号的意指行为是由于符号系统自身产生的而不是依赖于所指，强调符号的意指实践能力及建构能力，则使符号成为与权力运作一体两面的生产性的“话语”。对于巴特勒的“操演”理论来说，符号能动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即奥斯汀区分出的不同于陈述性言语的另外一种言语，如婚礼上面对牧师“你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吗？”的征询，新郎坚定而喜悦的“我愿意！”一语，不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是本身即构成了一个行为：“很明显，在这些例子中说出一句话（当然，要在合适的情境下）不是描述我所做的事情或陈述我正在做的事情：说这些话就是在做事。”<sup>③</sup> 奥斯汀将这一类型的话语称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因其表明“言语的发出就是在实施一个行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场景与阿尔都塞著名的警察询问场景很相似：警察过“嗨！叫你呢！”这一言语询问（intepellation），大街上被询问

① Judith Butler, “Gender as Performance: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Radical Philosophy: A Journal of Socialist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67 (Summer): 32.

② Judith Butler and Athena Athanasiou, *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Cambridge&Malden: Polity Press, 2013, p. ix.

③ John Langshaw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

的那个人“仅仅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就变成了一个主体”<sup>①</sup>。这里，符号的能动性变成了话语的决定性，是话语产生了那个主体，就像拉康的律法以其强制性使那个“它”在符号域中注册从而成为主体（“他”或“她”）。

话语的建构成为一种排除了能动性的决定论。在巴特勒看来，问题在于“阿尔都塞把这种‘招呼’或‘询唤’设想为一种单边行为”，“没有考虑到这一询唤律法所可能引出的一系列违反。律法不但有可能被拒绝，而且有可能被破裂，被迫进行重新表述（rearticulation），使其自身单边运转方式的一种论式的强制性受到质疑”<sup>②</sup>。这一施行的构成性失败又与德里达所说的符号的失败有关。德里达的符号思考起因于对胡塞尔的“意谓”（*Bedeutung*）概念的思考。为了保证意向性行为构成的含义的纯粹同一性，胡塞尔坚持与意谓同一性相应的符号表达的无限可重复性。“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将不是一个符号”<sup>③</sup>，意向性的、观念的纯粹性要求符号能够无限地自我重复，即在符号的意指中“能指总能绝对地达到所指”，从而维护“在场”的优先特权。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重复性不能保证意指的统一性，而恰恰是意义分裂乃至增殖的根源，原因在于，如前所引的奥斯汀关于施行话语的论断：一个施行话语或询唤必须在合适的情境下才有效，而符号的可重复性又要求符号“必须能够将其从其生产的当下在场与单一意向中剥离出来”<sup>④</sup>，从而有一个符号的失败。这一超出了其原初语境的再次使用固然是历史意指的失败，但也可以看作新的意指及与其相应的情境生成的无限可能性。因此，符号的重复不是保持其意义自我统一性、保证话语建构同样有效性的构成机制，而是意义延异、撒播的路径，因为，符号的任意性所代表的差异性一开始就植根于符号的内在结构中，符号与其被看作一个忠实于能指的所指，不如看作一个意谓不断位移的踪迹（trace）。“踪迹”是对在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神学中那个起核心作用的超验所指的解构，同时“它的功能也动摇了符号的形而上学的决定性”<sup>⑤</sup>。

① [法]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②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82.

③ Jacques Derrida, *Voice and Phenomeno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Sig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rans. Leonard Lawlo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2.

④ Jacques Derrida,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ed. Peggy Kam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7.

⑤ Niall Lucy, *A Derrida Dictionary*. Malden,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144.

德里达关于符号重复性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巴特勒赋予“操演”的特别的能动性含义，“如果借助德里达的征引概念重新思考，操演将对诸政治能指的操演性特征给予说明，其中一个根本的民主理论将被发现有其价值”<sup>①</sup>。但是德里达有关重复性征引及其中可能的失败等的说明，只是对霸权话语形态的解构，其能动性所蕴含的解放的民主含义只停留在“去中心化”的意义上，其所提供的只是解构之后的诸多可能性，缺乏能动性所特有的在积极方向上的要求。由此，在由符号的重复性所导致的话语的重新意指方面，巴特勒要彻底解决的能动性难题是如何使这一重复性朝向某一个所需要的方向运动，或者说，如何使那些曾被规范话语所压制的存在从话语中建构出来。在这里，巴特勒又借助了精神分析对“重复性”的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症机制的解释将“压抑”视作生产性力量的可能，在忧郁症中，那对欲望的压抑既是对欲望的拒绝也是对欲望的保留，欲望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这也是福柯曾经分析过的抑制与生产合为一体的律法（话语）的本性。在精神分析的维度中巴特勒又需要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问题：身体的物质性如何体现？肉体生命真的可以在理论上化约为一个符号的存在吗？巴特勒虽然坚持身体的物质性，但她并没有把身体看作与其周遭具体情境一齐活灵活现的身体，而是看作——如其 *Bodies that Matter*（可以译成《麻烦的是身体》）一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话语的界限，是话语实践和符号意指所遭到的抵制。在这一抵制中，话语建构身体的物质性喻示的是某种超出话语体系的外在，“但它并非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外在’，即超出或反击话语边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在那儿’（thereness）”<sup>②</sup>，而是一种构成性外在，它指示的是话语边界的脆弱性以及运动性。以女同性恋者为例，异性恋的菲勒斯话语将身体作为令人嫌恶的对象排除为“外在”，这一“外在”作为“压抑”下的“无意识”<sup>③</sup>总是试图回归话语形态，从而使那些曾被贬黜的、嫌恶的存在在话语中建构出来。因此，事关一种能动性的抵制，巴氏又不能仅仅将身体当作一种话语的边界，而需要对欲望的身体、身体的欲望的额外援引。

①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43.

②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xvii.

③ 在这里，巴特勒显然是整合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与精神分析的话语理论，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一方面将主体按照话语的结构建构出来，同时将那种与规范性（normativity）相冲突的身体要素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剩余物”（remainder）构成了压抑机制中的无意识冲动，这些无意识冲动因子总会以种种变形重复出现在意识中，构成对意识话语的和已建构主体的某种威胁。

这里不再是符号自身的分裂逻辑，而是欲望的生产逻辑。被压抑的欲望的重复性，实质是渴求在话语秩序中的回返，曾经被符号秩序拒绝的东西试图重返回来。重复不仅是某种主体化未能出现的标记，同时也是主体化失败的标记，“在主体中所重复的是彻底排除于主体的形构之外的东西，是威胁到主体自身的边界和一致性的东西”<sup>①</sup>。这些曾被排除之物的回归不仅是对不可抗律法的破坏，也是“一个有效的分裂，一个对符号域进行彻底的再表述的时刻，其中身体变得至为关键了”<sup>②</sup>。

让我们在此处把巴特勒有关能动性的复杂解释简化一下。（1）性别身份与主体性都是由话语建构的，并不存在话语之外的身体，谈论话语之外的物质性是没有意义的；（2）建构论中主体的能动性被让渡给话语的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递变为话语决定论而排除了能动性；（3）话语决定论中的规范话语的霸权统治依赖于对“他者”的排除，这一排除对“他者”来说构成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压抑；（4）被压抑的欲望作为一种原初性创伤构成了对话语秩序的抵制，它总是要不断地表现自己；（5）曾被排除之物（痛苦的身体）在话语秩序中的破坏性回归构成了对现有话语形态的挑战，从而使话语的重新意指成为可能，这也是话语自身所包含的能动性之所在。在这些解释中，话语所包含的两面性充分体现出来：一方面，话语建构了主体，建构了身体；另一方面，话语又包含了主体活动的广阔空间，为主体提供某种能动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此能动性的说明并没有忠实地存在于话语符号之内。在能动性证成的关键——符号的重复性上，我们不得不引入一个异质性的外援，即与感知和物质性紧密联系的身体的欲望，这身体并非如福柯、拉康、巴特勒等社会建构论者所坚持的那样，完全是由符号建构的——这构成了身体建构论的一个内在矛盾；再者，身体的物质性也并不如巴特勒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一个话语意指的界限。以符号吞噬身体也许与自索绪尔以来的能指/所指的二元区分有关，只不过符号建构论者采取了将所指消融到能指中的策略，这一“文化”覆盖“自然”的策略在解决身心二分、以心控身的传统模式中恰恰是沿着笛卡尔的道路行进并将其推到极致的。综合来看，这一立场的极端性，也许预示了另一个议题——梅洛-庞蒂的身体观，即作为活现（embodiment）的身体的重要性，其要走出同样可能极端的肉身性立场，跳出西方文化的框

<sup>①</sup>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90.

<sup>②</sup>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7.

架去思考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作者简介：**

张兵，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Author:**

Zhang Bing, Ph. D. in Philosophy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teaches philosophy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Xi'an. His research centers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E-mail: zbl8zbl8@163. com